

传统文化教育,如何才能“教得好”

□ 柯小剛

职业培训需要,同时,尤其要认识到教育古今之变的大背景,不必堕入“国学情怀党”,也不要落入“民族主义”的误区。

目前的世界格局是跨国大企业和国家间交错竞争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每个国家都特别需要培养一大批既具备全球视野又热爱本国历史文化的政商精英人才,也非常需要大量既有专业技能又能负责地发挥专业技能的普通职员。无论政商精英的全球视野还是普通职员的专业技能,都是现代教育体系所能提供的;然而,精英的本国历史文化认同和职员的职业伦理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赖于传统德性教育的培养。

因此,古典文化、传统道德和德性教育在现代社会的貌似不再有用,而且似乎已经衰落到没有,但实际上却一直是未曾或缺的基础,默默地支撑着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建筑。一旦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现代生活的隐秘守护神,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当现代文明面临危机的时候(目前中西文明都面临危机),在世界秩序濒临失衡的格局中,重读古典、复古更化、返古开新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困境中回到起点,然后重新找到方向,焕然一新地出发:这既是个人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屡见不鲜的历史经验。如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仅是中国文明的使命,也是现代人类面临的普遍任务。

“大跃进”、“土法炼钢”式的读经教学法,让少儿读经运动毁誉参半

从2004年前后兴起“国学热”、“读经热”至今,民间传统文化传播和教育已经积累了十年的经验教训。两个主要的事件可以作为考察的样本:一是央视“百家讲坛”推动的“国学热”影响很大,但也争议不断;二是各地兴起的“少儿读经学校”发展迅猛(最近达到了大约3000所),但同样也是毁誉参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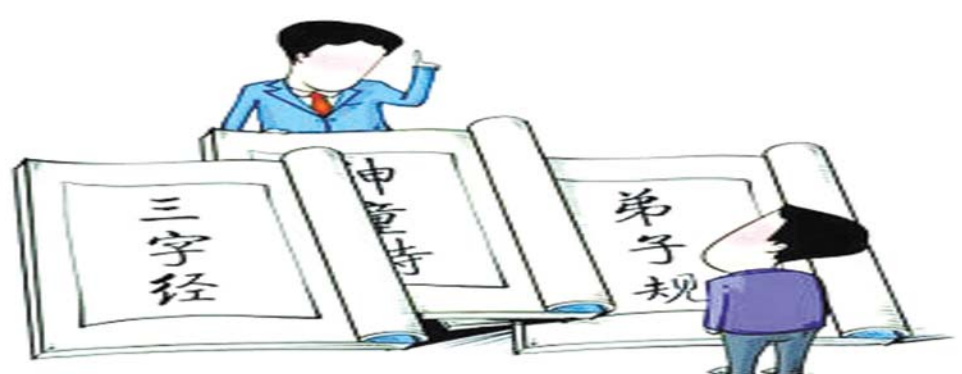
目前围绕读经运动的争论并不健康,夹杂太多或左或右意识形态的偏见。有些分析和报道并不客观,是带有眼镜看问题,意在扼杀刚刚兴起的文化复兴萌芽。另一方面,捍卫读经运动的声音也不够理性,有些甚至带有宗教狂热色彩,非常不利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健康发展。对于十年读经运动和民间国学热,目前最需要的是带有同情理解态度的冷静观察、理性分析、总结得失,形成良性的互相监督批评,引导民间国学教育走上正轨,乃至能对体制内的国学教育带来有益的经验借鉴,实现体制内外传统文化教育的良性互动。

民间国学教育首先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对礼仪教育的重视。当然,流于形式、作秀式的礼仪教育目前很流行,这是礼仪教育的误区。所谓“立于礼”:礼的本质含义是学会做人一样生活,建立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儿童和青少年

年来说,日常家务、生活自理、洒扫应对、修身成人是礼仪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我个人接触到的孩子而言,传统私塾出来的学生在这些方面还是有突出优势的。相比之下,体制内中小学的礼仪教育和修身教育要差很多,家长不够重视,学校也不够重视,一心只忙着应试、升学,不关心孩子的感情能力、为人处事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身心人格的全面发展。这些都跟“礼教”的缺失有关系。在这方面,体制内的中小学教育可以借鉴民间国学教育经验的地方很多。当然,民间国学教育在这方面也有问题,譬如过分抬高《弟子规》的意义(有的民间国学机构宣称弟子规比全部五经四书加起来还重要),或者用一种过分宗教化的形式来推广“孝道”(过分的感情渲染和超出常理的牺牲精神等),对学生进行过于严厉的管教乃至体罚,恢复一些失去现实意义的繁文缛节等等,都是需要批评和改正的极端倾向。

读经教育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不许讲解经文的经文背诵,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读经教育的师资队伍良莠不齐。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找了很多理由来论证背诵的重要性,但背诵无论多么重要也无法论证“不许讲解”的合理性。“不许讲解”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因为背诵的好处很多(这两点没关系,或者,真正的关系是:只有讲解才能促进背诵),而是因为找不到足够多、足够的讲经师资。近现代以来,对经典的错误解释,简单化解经,乃至厚诬圣贤、矮化经典的所谓“经典研究”和“经典解释”也确实太多了,太嚣张了,以至于无论在学术成果中,还是在媒体和中小学课本中,都屡见不鲜。这可能也是导致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激进反对任何经典解释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们相信诵读的声音本身就有魔力(甚至相信背诵无须识字),这一点可能是受到某些宗教的影响。对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的失望,对圣贤经典的一知半解和“不明觉厉”的崇拜,对某些宗教信仰方式的借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是形成读经运动的重要原因。这都是可以同情理解的。

然而,这样形成的读经运动,其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担心的。首先是学生的受害。我接触过一些在读经学校背过多年经典的孩子。一方面,他们张口即能背诵经典,令人惊赞;另一方面,他们能背诵却不能引用,因为根本不知道经文是什么意思,又令人遗憾。更令人遗憾的是,被强迫的大量死记硬背,使一些学生对经典形成了恐惧心理和逆反心理,彻底反转了读经的初衷,岂不令人痛心!“只许背诵不许讲解”的第二个不良影响是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的总体声誉受损。“只许背诵不许讲解”的“教学方法”一方面来自道听途说的“传统蒙学”(可能跟五丁小说及现代电影对古代私塾的漫画化抹黑有关),一方面可能也是一种想在师资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尽快扩大读经运动的策略。倡导者推广读经的紧迫



别说上学无用

□ 王世奇

死知识和文凭,就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于21世纪的知识青年来说,除了知识,想改变命运,更需要将知识转化为过硬的技能,开放、合作的性情,主动的参与,积极的思想,强悍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内在的综合素质。换言之,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片面抱怨上大学没改变你的命运,而要反思自己上大学期间干了什么,因为你所做的才能决定你的出路。那些认为“上大学无用”者,不少是在大学期间失去了努力方向的人,他们丧失了拼劲,在虚度时光中勉强混一张文凭,没学到一技之长,到头来腹中空空。在毕业之后的同学会上我们会发现,那些毕业后做出成绩的同学大多还是那些在上大学期间努力学习的学生,正是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此外,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发生了改变,某些领域的人力需求大幅增长,自然造成相应职业的劳动力短缺及薪酬的提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家政、家装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所以,合格的脑力劳动者和合格的体力劳动者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只能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不合格的脑力劳动者”供应过剩,“合格的脑力、体力劳动者”供应不足的阶段。从长远看,劳动力市场对于合格的“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仍然旺盛,也会推动这些群体改变自己的命运。如,目前大约有50万外国人长期在上海生活,为其提供家政服务的服务员的工资

自然要高于一般的家政服务员。可是,如果没有大专以上学历,不懂外语等知识是不大可能被聘用的,由此足以证明学历和知识的威力。总之,尽管出现了“因教返贫”现象,但是那些没读过书的人,处在社会下层的比例更多。换个言,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片面抱怨上大学没改变你的命运,而要反思自己上大学期间干了什么,因为你所做的才能决定你的出路。那些认为“上大学无用”者,不少是在大学期间失去了努力方向的人,他们丧失了拼劲,在虚度时光中勉强混一张文凭,没学到一技之长,到头来腹中空空。在毕业之后的同学会上我们会发现,那些毕业后做出成绩的同学大多还是那些在上大学期间努力学习的学生,正是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上学无用论”的出现,还和怎么理解成功具有密切的关系。现在社会上对成功的理解太一元化,几乎都落实到钱上去了。这种理解无疑是狭隘的,因为在相当程度上金钱是不能代表成功的。培养一个暴发户很容易,培养一个贵族却需要好几代,可是我们总不至于只追求做一个暴发户吧?大学是人文精神的家园,接受大学教育有助于培养高尚的情操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让人一生受益无穷,即便仅仅从收入的角度考虑,大学毕业生也不要因为暂时的收入不理想就认为“上大学不值”,因为自己投入的学费和精力,是为未来铺路的,尽管自

己的收入可能暂时会比农民工低,但自己的发展后劲与职业提升空间却是农民工不可比拟的。在历史上,韩信苦读兵书,心怀天下,却久无大赏识,巨鹿之战时不过是项羽手下的虾兵蟹将。旁人会笑他的付出不值得,但他却默默等待机会,直到遇到刘邦,他所有的本领都派上了用场。

在科技变革与信息化日新月异的今天,倘若没有基本的科学素养与知识内涵,一个人很难造就自己的人生梦想,或者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李嘉诚先生对此问题感触尤深。他说:我最幸运的是很早就知道“知识改变命运”,在我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知识帮了我的大忙,我一有空就读书,读业务有关知识,也读别人成功的经验,不断寻求新知。毋庸置疑,个人确实通过“拼爹”找到了好职位,但28岁的邓鹤翔被聘为武汉大学教授,22岁的刘嘉亿被聘为中南大学正教授级研究员等事例说明:这个社会每天都有大量的年轻人通过知识改变了自己命运。一个人的命运最终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其一味埋怨命运不济,倒不如努力从自己做起。在“起薪”之外,人生中还包含着更为重要的“发展机会”、“后赋潜能”等,知识群体的人生尽管可能是曲线的,甚至会有起落,但未来预期相对更好。知识改变的是人生向上的机会,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知识货币化的能力。我们绝对有理由坚信:只有靠知识才能真正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

民间国学教育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真正的、读书会式的书院应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那么,现代社会的经典教育应该如何展开?倚靠“国学大师”和社会国学教育进阶?前已分析过,那里良莠不齐,问题很多,误人不浅。倚靠学院学者和大学教育培训?前面也已分析过,现代学院学术的起源和迄今为止的主流恰恰是批判传统文学、诋毁经典认识的形象。在目前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文明复兴事业中,大学的专家学者跟中小学教师一样,主要是受教育对象,而不是可信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者。

那么,还剩下什么可能性?只有古人、经典和我们自己。古人往矣,自不可见,而经典俱在,尤其是与经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代注疏都还在。还有,我们这些有志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也还在。因此,读书会式书院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什么是书院?就是有圣贤经典,有老师同学,大家一起读书,这就是书院,即使是网络上的论坛和语音群聊读书会,也是真正的书院。在春天的野外,“浴沂沂,风乎舞雩”,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无门无户,师生问答,这就是书院。书院的本质在“人文”:有人,有文,就是书院。书院在心、在志,不在房子,资金和认证。如果各地学者、教师、学生、公务员、职员都建起朋友圈子的经典读书会,无论在现场,还是通过网络,一字一句读古人的经典和注疏(有注疏的帮助和读书会的讨论,经典并不难),譬如《五经正义》、《四书集注》之类,书院就相当于各地恢复了。相对于读书会而言,这些年在各地兴建的仿古书院建筑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旅游景点,土豪会所或江湖大师的高级地摊而已。等到各地读书会在经典的自我教育中培养出一批儒士和商人,以及有传统素质的教师、记者、官员、生和职员,无论体制内外的传统文化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因此,真正的、读书会式的书院,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首先,目前国家意识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亟须软实力的支撑,所以,国家开始积极提倡和支持传统文化教育,大环境逐步乐观;其次,社会对于传统文化教育的自发需求非常大,这是刚需,绝非泡沫。在这种刚需的推动下,各种民间国学教育形式蓬勃涌现。近来,在国家提倡下,中小学和高校也开始跟进。在这个大背景下,民间书院会越来越多,发展态势良好;最后,中国有源远流长的书院传统。传统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这是屡见不鲜的历史常态。书院传统复兴,今日条件正好。(作者系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

感,使命感是应该得到善理解的,不过,“大跃进”、“土法炼钢”式的读经教学法却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六字真言”读经法(“小朋友,跟我读”六字真言)和高额学费让投机分子看到了商机。一夜之间,只要能认识汉语拼音,喉咙能发出人声的,不管原先是识汉字的还是屠狗的,都成了“书院山长”、“国学大师”,教起了国学,摆起了道场。我见过一些读经学生家长,他们抱怨吃过很多亏,被人骗过很多钱。这样下去,名誉受损的岂止是“读经运动”,而且是往圣先贤和经典本身啊!近两年来,全国各地的读经班陆续招不满学生,有些读经学校逐渐倒闭,这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担忧。高兴的是邪气见消,担忧的是青黄不接、正气不见光。

学林漫笔



与教育
民国治学

傅顾之争

□ 王学斌

学人相处,首倡之道还是尊重,而非霸道或诡道。

1926年下半年,胡适赴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顺道看望自己昔日得意门生傅斯年。自从七年前负笈英伦,傅辗转于爱丁堡、伦敦及柏林大学,所学专业更是从实验心理学、数学,相对论到比较语言学。表面上看,傅氏所涉甚杂,似有学艺不精之嫌,不拿一个学位,令人疑其用功不足;再者七年内傅未出一书,未刊一文,回想当年自己留美期间勤于著述的情形,胡适着实心焦担忧。故此傅氏给胡的印象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口若悬河,妙语迭出,胡氏感慨“孟真今天谈的极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记下来”,另一方面傅又似仅限于海聊,一丝隐忧终浮上心头,“这几天与孟真谈,虽感觉愉快,然未免同时感觉失望。孟真颇豁达,远不如顾刚之勤。”据说胡的日记原稿本上,下文还用“墨笔划掉九行”,也就是说,他极有可能对傅氏有着更为激烈的批评与不满。

至少在傅氏归国前,在老师心目中,其形象已远不及及傅位弟子顾颉刚。与傅不同,即使世界那么大,顾氏也不愿去看看,而是追随恩师,沉潜于学术之中,几年内声名鹊起。尤其到了1923年,顾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学界掀起狂澜,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古史讨论,是为“古史辨运动”。自此,顾一举奠定了其在学界的显赫地位,其学识深受彼时学者推崇,如郭沫若认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难怪尚在留学的傅氏眼瞅同学羽翼渐丰,反思个人寸功未立,钦佩之情由衷而发:“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里;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再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

就当顾氏于学坛春风得意、日超得势之际,远在欧陆的傅氏在众人脑中印象,仍停留在五四前后的青年舵手上面。易言之,单论学术影响力,顾已甩开傅半条街。然人生际遇迥难以捉摸。当胡适替弟子惋惜之时,傅斯年已于当年冬天火速回国,且于次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往日霸气十足的“傅大炮”重现江湖。

与顾氏扬名学坛的路径迥异,傅氏之崛起,凭依的更多是学术组织与事业领导方面的突出能力。抵粤不久,傅便利用各种人脉关系与高明手腕,四处聘用挖人,发展中大人文学科。时在厦大执教的顾颉刚,自然成为傅氏的碗中肉。于是傅施展长袖善舞之术,冲破重重阻挠,将顾延揽至中大。按理说,当年同住北大西斋四号宿舍的老同学,彼此知根知底,甚为投契,双剑合璧,应是一对黄金搭档,孰料其后的发展竟是一时瑜亮,挚友闹墙。

作为“西楚霸王”式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的抱负自然是欲集聚国内最顶尖的学者,塑造一支学术梦之队。不过作为已成名成家之人,顾颉刚自不甘为傅氏做嫁衣裳,他后来自剖心迹:“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故二人个性迥异,加之追求不同,终致争执于激烈。1928年4月29日,傅、顾因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事宜发生分歧,“孟真不愿我不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道相左,今晚遂致破口大骂”,之后傅认定在人手紧缺、百废待兴之际,顾非但亦步亦趋,鼎力相助,还怀有离开中大之意,分明是故意拆台,于是勃然大怒,说顾“忘恩负义”,放话“你若离开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你无处去”。傅此种底气十足的行径,似已不能用霸气形容。多年同窗竟说出这般狠话,令顾失望至极,此事仿佛钻入骨髓,让他一生耿耿于怀。

发生口角后,顾氏曾生弥合裂痕之意,致信恩师胡氏,倾诉苦衷,“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向了:(1)自实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点,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足相拂逆的,是我办事太喜欢有轨道,什么事情都喜欢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无轨道。又我的责任心之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有一艺之长,都能一天一天的加工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真则对人意见,爱人之心没有命令之心强,所以在任人方面,两人的意见便时时抵触。”顾希望恩师从中斡旋调停,化解纠纷,并囑切不可将信的内容告知傅。孰料后来傅在胡适处又看到此信,因之大动肝火,回来与顾又大吵一架。并挖苦顾氏治学乃“上等的天分,中等的天分,下等的材料”,控“所用方法只有历史的和结账的两种。又谓历史方法不过一个历史观念而已”。既然道渐不同,话愈难听,顾毅然选择北上,不再受“鸟气”。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顾负气离开,但傅却一直希望将其重新拉回史语所,所用招数可谓软硬兼施。如承诺给顾提供四百元诱人月薪。此计不成,傅又采用挖苦激将之法,责问傅燕大的顾“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只是顾始终不为所动,也忍不住讽刺傅“奸作后台,一手扶来,一手扶胡,以张其势,真谓大丞相也。”琴瑟已毁,知音不再。

细观傅、顾彼此间之种种矛盾,颇有某些瑜亮情结之意味。当年二人携手意气风发,后虽各自天涯,但依旧惺惺相惜。只是两位都想做学界头把交椅且理念各异,若共创基业,实在难上加难,称得上合则两伤,离则双美。傅对顾无论冷嘲热讽,抑或软磨硬泡,皆表明其对顾氏之才干极为看重,否则他不会对一个不入法眼之人徒费精力。然于学术共同体中共处,首倡之道恐怕还是尊重,而非各种计谋,甚或施之以废气。学人之间倘俱用霸道或诡道,那么互相之合作,便如沙上建塔,倒塌乃迟早事。